

漢代西北邊境的研究
居延漢簡和京都大學
野口 優 (NOGUCHI Yū) *

1、發現居延漢簡的歷史

簡牘的研究是在二十世紀初年開始的。1901年，英國探檢家奧萊爾·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尼雅遺址中發現了從三世紀到四世紀中國晉代的50枚木簡。另外，同年，瑞典探檢家斯文·赫定在探索夢幻之湖羅布泊的時候，在樓蘭遺址中發現了晉代的120枚木簡。這是首次在邊境發現簡牘。之後，1907年，在敦煌一帶進行調查的斯坦因又在散佈於河西走廊的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了七百多枚漢簡。1912年法國漢學大師沙畹解讀了這七百多支漢簡。翌年，王國維參照沙畹的研究成果寫成《流沙墜簡》。此著作被視為以後漢簡研究的基礎。

後來，1930年，由斯文·赫定任隊長的中國與瑞典聯合組織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在橫跨現今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的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了一萬多枚漢簡。這些簡牘便是所謂的居延漢簡。關於居延漢簡的釋文、圖版的公開出版以及研究時所遇到的困難，我們將在下一章節進行論述。

1972-1973年居延新簡的發現是邊境漢簡的又一次大發現。在1960年代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動亂總算開始平息的時期，考古隊對出土過居延漢簡的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現了大約兩萬枚漢簡。這次考古調查重點發掘了作為軍事設施的候官和以及作為交通要衝的關所¹。關於在候官發現的約八千枚簡牘，其釋文於1990年出版，圖版也於1994年出版。而在關所發現的約一萬兩千枚簡牘，直到2011年底才開始以圖書《肩水金關漢簡》的形式出版。《肩水金關漢簡》包含釋文和照片，共五冊。目前（2015年12月底）已經出版了三冊。

並且，1999-2002年考古隊又對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調查，這次是以1972、73年調查時尚未涉足過的烽燧遺址為中心進行發掘的，共發現了約七百枚漢簡。這些簡牘就是所謂的額濟納漢簡。額濟納漢簡在2005年以圖書《額濟納漢簡》的形式出版，此書包含釋文和照片。

但是，即使到目前為止，依然有很多已出土的邊境漢簡尚未公開出版。將來，如果這些漢簡能夠出版，將會深化對於漢簡的研究。而且，第二次大戰後，從古墓和古井中有非常多的簡牘被發現。其總數已經超過了十五萬枚。因此，如果我們將漢簡作為主要史料來靈活運用的話，相信能取得切實的成果。

2、1930年後居延漢簡研究的艱難歷史

1930年居延漢簡發現以後，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即開始了對簡牘的解讀工作。可是因1930年代末中日戰爭的爆發，研究被迫中斷。之後，被疏散到四川省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勞幹繼續對居延漢簡進行解讀和研究。於1943年將居延漢簡的釋文在四川省南溪出版，即《居延漢簡釋文之部》。1944年，勞幹又用居延漢簡的內容考證漢代制度史而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戰後，由於國共內戰，勞幹移居台灣。此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居延漢簡的研究中，於1976年出版了《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篇》。這本書是他對於居延

* 日本國京都大學·文學系·外聘講師。

¹ 候官是管理烽燧的軍政重要官衙，相當於漢代管理民政的縣。

漢簡的研究成果。而居延漢簡的圖版出版是在 1957 年，由台灣中央研究院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此書的出版，使 1930 年出土的居延漢簡的大部分照片得到公開。居延漢簡的圖版出版太晚的原因是由於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圖版的製版在戰爭中被兩次焚毀²。

但是，居延漢簡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的問題。多數漢簡的出土地是不清楚的。多數居延漢簡屬於軍政和行政文書。因此，為了辨別某漢簡是在出土地製作的副本還是從別的官衙送來的正本，其出土地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出土地不清楚的話，我們無法知道居延漢簡的移動和保存情況。1959 年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³。約佔全部三分之一的居延漢簡的出土地得到判明。而 1980 年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這才意味著最終全部弄清了居延漢簡的出土地。就是說，從 1930 年發現起經歷五十年的歲月，全部居延漢簡的出土地才得到判明。

而且，為了避免中日戰爭的戰禍，1937 年居延漢簡被運往香港，1940 年又被運往美國。此後二十五年，居延漢簡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被嚴格保管。直到 1965 年漢簡才被運回台灣⁴。現在，居延漢簡被保存於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庫中。

3、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居延漢簡研究班的居延漢簡研究

1951 年，勞幹先生所著的《居延漢簡釋文之部》被介紹至日本。以此為契機，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結成了以森鹿三為班長的居延漢簡共同研究班。這個研究班成為了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嚆矢⁵。成員除了森鹿三以外，還有藤枝晃、米田健次郎、大庭修、永田英正、魯惟一（Michael Loewe，英國的中國學者）等學者。因為當時看不到圖版，所以他們的研究只好以勞幹先生所譯解的釋文為依據，而無法對勞幹先生的譯解作出批評與討論。他們既無法獲知文字的大小、文字的書寫位置、筆跡的識別、墨跡的濃淡等研究古文書時最基本的信息，也無法知道簡牘自何處出土。他們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展開研究。這意味著他們完全無法考察簡牘的移動。該文書到底是正本、副本或者草稿？該信息在決定文書性質上最為重要，可是他們無法知曉。然而，他們在如此困難的研究情況下，還是發表了《東洋史研究》第 12 卷第 3 號「居延漢簡の研究」特集號（1953 年）⁶，以及藤枝晃的《長城のまもり：河西地方出土の漢代木簡の内容の概観》（1955 年）⁷。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學者參閱他們當時所做的研究。1950 年代末，居延漢簡研究史上很重大的轉機出現了。即 1957 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及 1959 年《居延漢簡甲篇》的出版，這些都促進了研究。這兩本書的出版明確了簡牘的形式、格式、文字墨色的濃淡等情況，還使利用古文書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居延漢簡成為可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班發表了森鹿三的「居延漢簡の集成：

² 關於居延漢簡研究的艱難歷史，請參閱富谷至《竹簡・木簡が語る中國古代：書記の文化史》（岩波書店、2003 年），第 59-67 頁。

³ 1977 年社會科學院設立以後，考古研究所附屬於社會科學院。

⁴ 關於居延漢簡被運往香港和美國的事情，請參閱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中華書局、2011 年），第 389-424 頁。

⁵ 關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居延漢簡研究，請參閱永田英正所著『居延漢簡の研究』（同朋舍、1989 年）之序章，第 26-42 頁。

⁶ 《東洋史研究》12-3 的內容如下：森鹿三「居延漢簡研究序說」、大庭修「漢代における功次の升進について」、伊藤道治「漢代居延戰線の展開」、米田賢次郎「漢代の邊境組織：燧の配置について」、岡崎敬「漢代邊境兵士の被服について」、吉田光邦「弓と弩」、日比野丈夫「漢簡所見地名考」、川勝義雄「居延漢簡年表」。

⁷ 這篇論文被收錄在ユーラシア學會編『遊牧民族の研究：ユーラシア學會研究報告』（自然と文化 / 自然史學會編：別編 2）。

とくに第二亭食簿について」（1959 年）、「居延出土の卒家屬廩名籍について」（1960 年）等論文⁸。在圖版及出土地公開後不久，大庭修先生還發表了「居延出土の詔書冊と詔書斷簡について」（1961 年），利用斷簡復原了漢代的詔令，明確了詔令的製作、傳達過程⁹。

至 60 年代末，在居延漢簡古文書學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被發表了。這就是魯惟一先生的《漢代行政記錄》“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 年）。魯惟一先生據出土地逐一區別簡牘的格式，並據墨跡盡力復原冊書。他的研究為古文書學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礎。進一步發展其研究的是永田英正先生。永田先生對魯惟一先生所做的文書格式分類作了進一步區分。之後按此分類，復原了簡牘出土地官署擁有的職務及機能。最後他加上關於格式區別的詳細說明，出版了以上的研究。這就是『居延漢簡の研究』（1989 年）。可以說，1950 年代末期，圖版的出版與出土地的判明，使得這兩位的研究確立了居延漢簡的古文書學式的研究模式。

之後，居延漢簡研究上再次出現了很大的轉機。1990 年居延新簡中候官出土的八千枚新簡的釋文公開出版。另外，圖版也於 1994 年出版。1972 年出土的居延新簡包含很多冊書，而利用該冊書，可以明確漢代邊境的審判與軍事制度的實際樣貌。

此外，2005 年《額濟納漢簡》的公開與 2011 年起《肩水金關漢簡》的公開，更進一步深化了居延漢簡的研究。

在以上邊境漢簡增多的背景下，居延新簡出土之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富谷至教授再次創辦了居延漢簡研究班，考證居延漢簡中的語彙以及事項。其研究成果已於 2015 年 3 月出版。這就是《漢簡語彙：中國古代木簡辭典》及《漢簡語彙考證》。

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古文書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當然，取得成果的並不只有日本。最近，中國大陸及台灣也出現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¹⁰。相信今後，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之間也一定會有熱烈的交流與研究。

⁸ 《東洋學研究 居延漢簡篇》收錄了森鹿三先生的大量論文（同朋舍、1975 年）。

⁹ 《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 年）以及《漢簡研究》（同朋舍、1992 年）收錄了大庭修先生的大量論文。

¹⁰ 比如在中國大陸出版了李均明先生的《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 年），在台灣出版了邢義田先生的《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中華書局、2011 年）。此外，在中國大陸與台灣還出版了大量研究專著。

	日・中・台大事件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出版相關
1901	義和團運動終束	斯坦因在尼雅遺址中 發現了中國晉代的木簡	
		斯文・赫定在樓蘭遺址中 發現了中國晉代的木簡	
1907		斯文・赫定在河西走廊 發現了漢簡	
1911	清朝滅亡		
1912	中華民國成立		王国維《簡牘檢署考》（在京都）
1914			王国維《流沙墜簡》
1930		西北科学考查团發現了 居延漢簡。	
1937	七七事变爆發(7月)	居延漢簡被運往香港(年底)	
1940		居延漢簡被運往美國	
1941	太平洋战争爆發 日本軍占領香港		
1943			勞榦《居延漢簡積文之部》（石印本）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		
1946	国共内戰爆發		
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勞榦《居延漢簡積文之部》（排印本）
1953		米國與台灣間的返還漢簡交涉	《東洋史研究》居延漢簡特集号
1959			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篇》
1965		居延漢簡被運回台灣	
1966	文化大革命開始	台灣檢查居延漢簡	
1967			魯惟一Michael Loewe 《漢代行政記錄》
1972		居延新簡的發掘	
1975			森鹿三《東洋学研究 居延漢簡篇》
1976	文化大革命終束		勞榦《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篇》
1977	社会科学院成立		
1980			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篇》
1982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
1989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の研究》
1990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与第四燧》
1991			大庭脩《漢簡研究》
1994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
1999		額濟納漢簡的發掘	
2005			《額濟納漢簡》
2011			《肩水金關漢簡》開始出版
2015			《漢簡語彙：中国古代木簡辭典》